

拉美族群政治的发展

——以玻利维亚为例

李 菡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族群政治在拉美兴起，其主要特征是一批新兴印第安族群政党的产生。在历史上，拉美族群政党的发展并不显著，这主要归因于该地区存在的制度障碍、资源不足和种族意识相对淡薄。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进，族群政党在拉美各国大量涌现。印第安族群政党是印第安人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印第安族群的政治参与，提升了自身政治表达的有效性。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是拉美迄今最为成功的印第安族群政党，它的形成是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数十年自主政治动员的成果。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族群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没有引发或加剧国内的族群矛盾。它取得竞选成功主要归因于该党的政治诉求和政治主张能够跨越族群边界，构建更广的选民光谱，实施具有多族群联盟的包容性政治策略，保持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好地适应了玻利维亚的社会现状。

关键词：玻利维亚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族群政治
族群政党 印第安人

作者简介：李菡，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8) 04-0136-15

印第安人是拉美历史上长期遭受排斥的弱势群体。他们对社会经济权益和政治平等权利的诉求一直受到压制和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为印第安人开辟了政治参与空间,印第安族群政党在拉美政坛兴起。拉美左派政治力量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受排斥的印第安人融入国家政治体系,从而促使拉美涌现出更多的印第安族群政党。

在拉美,印第安人是最主要的少数族群。^①随着印第安人在政治上的崛起,族群因素在拉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在国际上,族群政治研究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从族群的视角来理解政治,二是研究不同族群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尤其是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关系成为研究主流。^②目前,学术界对印第安族群政治的研究集中于印第安社会运动和印第安政党。^③比如罗伯塔·赖斯和范科特两位学者分别通过制度因素和社会运动理论路径解释族群政党产生的原因。前者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解释了强有力的印第安社会运动更有可能在政党体制缺乏有效代表性的国家中产生。后者则认为国内政治制度是主要解释变量,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有利于印第安政党的产生。哈维尔·阿尔沃则建议结合国内外因素解释印第安族群身份的政治化。劳尔·马德里指出具有包容性的族群政党才能存续。

本文聚焦于拉美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印第安族群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ovimiento al Socialismo),通过案例研究解释该党如何实现族群合作关系,探析族群政治在拉美兴起的意义,进而阐述拉美地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演进方向和整体发展态势。

一 拉美印第安族群政治的兴起与发展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族群政治在拉美兴起,其主要特征是一批新兴印第安族群政党的产生。族群政党将族群利益置于首位,具有明确的族群诉求以

^① 2010年,拉美约有4200万印第安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

^② 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第1-13页。

^③ Roberta Rice, *The New Politics of Protest: Indigenous Mobi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s Neoliberal Er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2; Donna Lee Van Cott, *From Movements to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Xavier Albó, *Movimientos y Poder Indígena en Bolivia, Ecuador y Perú*,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Promoción del Campesinado (CIPCA), 2008; Raúl L. Madrid, *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赢得族群成员的支持。^①在此之前，拉美没有形成以族群属性划线的政党体系，也没有产生比较重要的族群政党。^②拉美公民通常不是依据族群界限投票。印第安人将选票投给不同的政党，尤其是全方位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号称代表所有的社会群体和族群，但是事实表明，印第安人常常受到忽视。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类政党并没有充分代表他们的利益，而是对其进行“控制和利用”，他们在这一政治联盟中充当“小伙伴”，缺少对党内重大决策的影响力，也很难进入党内最高领导层。而传统政党往往要求印第安政治领导人首先效忠于本党，而非他们所属的族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印第安人口比重较高的拉美国家，印第安运动开始组建政党，比如厄瓜多尔的帕恰库蒂克运动（MUPP - NP，1996年）、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MAS，1995年）和秘鲁的印第安亚马孙党（MIAP，1998年）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国也产生了许多印第安政党。印第安政党是印第安人政治参与扩大化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印第安人的政治参与，提高了他们政治表达的有效性。

族群政党在拉美政治格局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表1和表2显示1979—2011年拉美4国参加总统选举的18个族群政党中，大多数政党的得票率不足3%。仅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连续3次获得较多选票，厄瓜多尔帕恰库蒂克运动连续3次赢得超过15%的得票率后迅速衰落，在2006年选举中的得票率仅为2.2%。危地马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里戈韦塔·门楚（Rigoberta Menchú）创建的维纳克政治运动（Winaq）在2007年和2011年选举中的得票率约为3%。然而同一时期，欧洲的族群政党平均获得7.2%的议会席位，尤其是比利时、罗马尼亚、拉脱维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的族群政党均赢得10%以上的议席。在亚洲，印度和斯里兰卡的族群政党赢得了24.1%和12.4%的议席。南非的族群政党也十分成功。

拉美族群政党难以成功的原因可以归为三个因素：制度障碍、资源不足和种族意识相对淡薄。开放的制度环境是形成族群政党的必要条件。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严格的选举登记要求造成印第安政党难以形成。在玻利维亚，1995年之前产生的许多印第安政党存续时间都不长，这

^① Raúl L. Madrid, *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

^② Miguel Carrera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after the Third Wave: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in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 4, No. 1, 2012, pp. 135 - 153.

表 1 玻利维亚族群政党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 (1979—2009 年)

	1979	1980	1985	1989	1993
图帕克·卡特里印第安人运动 (MITKA)	1.9	1.2			
利马图帕克·卡特里印第安人运动 (MITKA - I)		1.3			
图帕克·卡特里革命运动 (MRTK)			1.1		
图帕克·卡特里革命解放运动 (MRTKL)			2.1	1.6	
卡特里解放统一阵线 (FULKA)				1.2	
全国卡特里运动 (MKN)					0.8
玻利维亚帕恰库蒂轴心 (EJE)					1.1
	1997	2002	2005	2009	
左联—人民主权大会 (IU - ASP)	3.7				
帕恰库蒂印第安运动 (MIP)		6.1	2.2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MAS)		20.9	53.7	64.2	
社会联盟 (AS)				2.3	
争取自由与主权的人民 (PULSO)				0.3	
爱国社会团结运动 (MUSPA)				0.5	

资料来源: Steven Levitsky, James Loxton, and Brandon Van Dyck, *Challenges of Party-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07.

表 2 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族群政党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率 (1996—2011 年)

	1996	1998	2002	2006
厄瓜多尔				
帕恰库蒂克运动 (MUPP - NP)	20.6	14.8	20.8	2.2
阿毛塔·哈达里独立运动 (MIAJ)			0.9	
	2006	2010		
哥伦比亚				
印第安社会联盟 (ASI)	1.2			
非洲裔哥伦比亚人社会联盟 (ASA)		0.1		
	2007	2011		
危地马拉				
维纳克政治运动 (Winaq)	3.1	3.3		

资料来源: Steven Levitsky, James Loxton, and Brandon Van Dyck, *Challenges of Party-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07.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选举制度障碍。自1979年以来,该国选举法规定,政党必须获得3%以上的得票率,否则会被取消登记资格并缴纳罚金。同时,政党必须获得5万张选票,否则须支付选票打印费。从1979年至1993年,只有图帕克·卡塔里革命解放运动的得票率为2.77%,其他印第安政党的得票率均不足2%。^①这种有失公平的制度设计造成印第安人需付出更高的政治参与成本,阻碍了印第安政党进入选举体制并赢得执政地位。在厄瓜多尔,1995年的宪法改革允许独立运动参与选举并取消异地注册限制,印第安社会运动才开始组建政党。^②秘鲁的印第安亚马孙运动因无法征集足够的签名而只能与其他传统政党联合参选。^③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为印第安人保留专门的国会议席,才推动了印第安政党的兴起。

资源不足同样是制约拉美族群政党发展的重要因素。拉美印第安人大多属于贫困阶层且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集聚用于组建政党的资源。在世界其他地区,族群政党的成员不仅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社会中层甚至上层。成功的族群政党一般是由享有社会经济优势的成员组成,比如比利时的佛兰芒人(Flemish)、南非的阿非利坎人(Afrikaners,多为荷兰人后裔)和印度的印度教徒(Hindus)。拉美印第安人属于弱势群体,其社会经济阶层不如白人和梅斯蒂索人。2002年,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分别有73.9%和80.2%的印第安人属于贫困阶层,其他族群所占比重分别为52.5%和57.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印第安人的受教育时间比其他族群平均少2—4年。贫困和受教育程度低削弱了印第安政党的竞争力。相较于传统政党,印第安政党无法从本族群和其他族群筹集足够的竞选资金,因而很难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获胜。

由于拉美经历的长期种族融合产生了大量的混血群体,族群界限趋于淡化,族群意识淡薄,因此印第安政党难以通过族群身份动员大量民众。同时,梅斯蒂索人对拉美国家族群关系的塑造具有深刻影响。19至20世纪,部分拉美国家将梅斯蒂索人作为构建国家团结的媒介,鼓励公民认可混合文化,而不是各族群的自身文化。一些国家的官方文化避免使用印第安语言。梅斯蒂

^① Donna Lee Van Cott, *From Movements to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2.

^② Jóhanna Kristín Birnir, "Stabilizing Party Systems and Excluding Segments of Society? The Effects of Formation Costs on New Party Founda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9, No. 3, 2004, p. 11.

^③ Roberta Rice and Donna Lee Van Cott, "The Emergence and Performance of Indigenous Peoples' Parties in South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9, No. 6, 2006, pp. 709-732.

索人逐渐成为许多拉美国家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印第安族群受到社会歧视导致许多梅斯蒂索人不愿认同自己的族群身份。在厄瓜多尔，全国只有6%的人认为自己是印第安人，而该国的印第安运动却代表了25%的印第安人。在玻利维亚，虽然有50%的人讲印第安语，75%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艾马拉或克丘亚文化，但是6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是梅斯蒂索人，只有不足20%的人认为自己是印第安人。政党候选人通常也不愿认同印第安人身份和表达族群诉求。因此，一些印第安政党选择与左翼政党或其他传统政党结盟。

在拉美国家，族群政党只有具备两个必要条件才可能克服上述障碍并获得选举成功：一是获得植根于社会的制度化组织的支持，二是该政党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特征。^①活跃的印第安社会运动为新兴政党参加竞选提供了人力和物质支持，尤其是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强大的印第安社会运动不仅提供组织资源，还为组建政党、获得选票赋予合法性。相反，秘鲁和危地马拉的印第安运动力量长期薄弱和碎片化，前者至今没有产生全国性印第安政党，后者的印第安政党在全国大选中表现平平。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情况与此相似，印第安运动的规模小、资源有限，没有产生比较有影响力的政党。此外，拉美长期的种族融合和由此导致的族群界限淡化使族群政治的极化程度较低。族群政党必须提出包容性而非排斥性主张，以吸引其他族群，扩大社会基础。显然，纯粹的族群政党无法扩大自己的力量。激进的卡塔里政党（Katarista），例如图帕克·卡塔里印第安人运动和帕恰库蒂印第安运动，它们的政治诉求具有浓厚的族群色彩，不仅无法吸引白人和梅斯蒂索人，而且实际上也难以得到多数印第安人的支持。激进立场的族群政党更有可能造成族群关系紧张，无法在全国产生影响力。因此，许多族群政党逐步克服狭隘的种族思想，提出包容性的政治主张，制订内容宽泛的政治纲领，以便吸引那些对传统政党和现状不满的白人和混血人。

二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玻利维亚印第安族群政治运动的产物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成立于1995年，是以玻利维亚古柯农工会联盟为主体的新兴左派族群政党。它是玻利维亚印第安人数十年自主政治动员的产

^① Raúl L. Madrid, “The Rise of Ethnopolitism in Latin America”, in *World Politics*, Vol. 60, No. 3, April 2008, pp. 475 – 508.

物。该国印第安族群政治的演变是通过族群身份政治化，产生两波强大的社会运动，进而形成族群政党。

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历经了被迫转换族群身份、后又获得国家认同的过程。玻利维亚是拉美第一个将印第安人的“族群”身份置换为“农民阶层”身份的国家。^①印第安人大规模参与“四月革命”（1952年）后，政府拒绝承认其族群身份。政府试图通过土地改革和农民协会，将印第安人的族群身份置换为“农民阶层”。然而，印第安人没有被完全同化，仍保持自身的传统习俗和社区组织结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军政府上台，印第安人的自治权受到冲击。为此，印第安农民开始按照族群身份组织动员，要求获得作为印第安人、印第安公民以及维护印第安社区的权利。1982年民主化以后，政府开始改变对印第安人的公开敌视，逐渐认可印第安人的权利与族群身份。相较于厄瓜多尔和秘鲁，玻利维亚是唯一经历了社会革命并将族群身份最大程度融入到国家象征的安第斯国家。^②

族群身份政治化过程始于高地的印第安群体并逐渐扩展至全国。玻利维亚印第安群体分为36个族群。克丘亚（Quechua）、艾马拉（Aymara）和乌鲁奇帕亚（Uru - Chipaya）这三个族群居住在地（即西部安第斯高地和山谷地区）。前两者占玻利维亚印第安总人数的85%。另外33个族群居住在低地，即北部亚马孙和东部查科平原地区，占全国人口的6%左右。高地印第安群体从事矿业劳动，从殖民和共和国时期就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抗议和组织经验。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就形成了紧密的农民工会组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地印第安社会运动兴起，其中备受瞩目的是卡塔里运动。这是由艾马拉知识分子和土地改革论者发起的文化中心论的原住民运动，强调印第安文化、印第安身份和宇宙观的重要性，并通过语言、象征符号和政治竞争，试图将族群文化议题融入玻利维亚的主流政治。同一时期，高地印第安群体还建立了全国最大的印第安组织——玻利维亚农民劳动者工会统一联合会（CSUTCB）。而低地印第安群体人口稀少，地处偏远，地区经济和政治权力长期掌控在大地产主手中。由于缺少政治参与经验和组织结构，低地印第安群体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形成印第安运动组织即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联

^① Xavier Albó, *Movimientos y Poder Indígena en Bolivia, Ecuador y Perú*,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Promoción del Campesinado (CIPCA), 2008, p. 35.

^② Jo - Marie Burt and Philip Mauerci, *Politics in the Andes: Identity, Conflict, Reform*,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p. 3.

合会 (CIDOB), 2000 年以后组建了印第安政党。

卡塔里运动促成了第一波印第安政党的产生, 比如图帕克·卡塔里革命运动、图帕克·卡塔里革命解放运动、图帕克·卡塔里印第安人运动。早期的印第安政党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 具有排斥性特征。图帕克·卡塔里印第安人运动强调族群身份, 反对多元文化主义, 要求将玻利维亚的大多数土地直接归族群组织管理, 重建殖民前的权力结构, 驱逐欧洲人, 反对工会组织形式。图帕克·卡塔里革命运动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主张多元文化主义, 强调族群多样性, 将西方和印第安人的政府形式相融合。由于早期的印第安政党与草根组织缺少紧密联系, 无法动员足够的组织资源参加竞选,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便逐渐消失, 但是族群议题却因此被纳入几乎所有政党的政治主张。^①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新兴印第安运动十分活跃。它们借鉴了卡塔里运动按族群身份动员的价值理念, 把已经形成的组织网络和政治合作空间作为基础, 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 参与土地改革、领地自治、城市化、教育改革等重要改革事宜的讨论。新一轮印第安运动中最活跃且影响力最大的是古柯种植者组织的社会运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在查巴雷地区产生了古柯种植者协会。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将许多国有矿业公司私有化, 大批失业的印第安矿工迁移到古柯种植区, 运用自身丰富的斗争经验组建了许多工会。20 世纪 80 年代, 为了抗议美国铲除古柯种植业的计划, 查巴雷地区约 5 万名古柯种植者建立了自己的古柯种植者协会。该协会由科恰班巴的 5 个古柯种植者联合会组成, 5 个联合会又由 160 个当地工会和 30 个联合分会构成,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玻利维亚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

新一轮印第安运动的兴起推动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源于查巴雷的古柯种植者运动, 是玻利维亚第一个从印第安农民运动中产生的政党。^②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古柯种植者联合会控制了全国最重要的玻利维亚农民劳动者工会统一联合会, 该联合会是全国最大的印第安组织, 其联系网络遍布全国九个省, 每个省约有 200 个中心, 此外还有 26 个地区级联合会。这两大印第安社会组织多年植根于印第安草根群体, 其组织成熟度、团结性和动员力度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提供了各种资源。

^① Jo-Marie Burt and Philip Mauceri, *Politics in the Andes: Identity, Conflict, Reform*,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4, p. 17.

^② Donna Lee Van Cott, *From Movements to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0.

1995年,玻利维亚农民劳动者工会统一联合会与玻利维亚全国农妇联合会(CNMCIQB-BS)和玻利维亚殖民者工会联合会(CSCB)共同组建了“争取人民主权大会”(ASP)。这是一个由古柯种植者和农民组成的社会运动组织,通过与左联(the United Left)联盟,在全国市政选举(1995年)和全国总统选举(1997年)中分别获得3%和3.7%的得票率,并取得了10个市长和4个代表查巴雷地区的国会议席。^①然而,古柯种植者希望构建独立的“政治工具”,不与传统政党结盟,于是又在“争取人民主权大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争取人民主权政治机构”,后于1998年改名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三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包容性的政治策略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脱胎于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古柯种植者社会运动。2000年以前,该党的竞选表现奠定了古柯种植者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基础。自此以后,扩大非核心基础是该党面临的挑战。“核心基础为其提供经济资源、决策支持和动员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政党的特性。然而,政党仅依靠核心基础通常无法成为举足轻重的竞选力量和胜利者。政党都要开辟非核心基础,扩大选举支持力量。”^②为此,“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从2000年以后逐渐转型成为多族群联盟的包容性族群政党。1985—2014年,在玻利维亚20个印第安政党中有85%的政党在全国大选中的得票率不超过5%,只有祖国意识党(Conciencia de Patria)、帕恰库蒂印第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较为成功。^③“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从中胜出是因为它采取了包容性的政治策略,具体表现为构建多族群联盟的组织基础,采取包容性的话语结构和政治主张,实施体现多族群利益的执政政策,保持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更好地适应了玻利维亚的社会现状。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在冲突中实践社会动员来扩大非核心基础、构建多族群组织联盟。冲突有助于塑造强烈的身份意识,促进组织构建和创造

^① Santiago Anria, “Social Movements,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opulism: Insights from the Bolivian MA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55, No. 3, 2013, p. 27.

^② Douglas A. Chalmers, María Carmo Campello de Souza, and Atilio A. Borón, *The Right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Praeger, 1992, pp. 13-42.

^③ Aline Sophia Hirseland, “The Effect of Linkages between Indigenous Peoples and Political Parties on Ethnic Voting in Bolivia”,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2017, p. 9.

一个活跃的基础。^①“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参与“水战争”（2000年）和“天然气战争”（2003年）的过程中，试图吸纳非印第安族群作为党内重要职位的候选人。2002年和2005年，该党副总统候选人分别是梅斯蒂索人、左翼知识分子安东尼奥·佩雷多（Antonio Peredo）和阿尔瓦罗·加西亚·利内拉（Alvaro Garcia Linera）。1997—2002年，该党立法团队的种族构成由全部是印第安人变为1/3以上是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到2005年，立法团队至少一半以上是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同时，党内还对非印第安族群开放竞选各级政府官员的候选人资格。此外，“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与城市组织建立联盟关系。2005年，该党与50多个全国和省级非印第安组织建立联盟。这些组织包括工人、手工业者、自营业者、卡车司机、教师和律师等工会和协会，梅斯蒂索人领导的中左翼政党“无畏运动”（MSM）以及人权组织和环境组织等。这些联盟为该党从地区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大党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支持。

在印第安族群内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与多族群组织建立联系。20世纪90年代末以前，高地和低地的印第安群体各自独立发展，几乎没有合作。“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植根于高地，与低地的印第安组织圣克鲁斯族群协会（CPESC）建立族群合作关系，获得了当地的组织资源。在拉美，任何政党无法仅依靠印第安人的支持赢得选举。这不仅是因为该群体人口规模小，还因为许多“印第安人”并不仅仅是印第安人，他还是西班牙人或梅斯蒂索人，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以及不同身份的优势。^②早期的印第安政党仅在本族群内部吸纳成员，比如克丘亚人组织的政党不与艾马拉族群建立任何联系，也不吸纳白人或梅斯蒂索人加入，因而很少得到其他族群的支持。^③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采取包容性的政治主张和话语结构，从而赢得各族群的支持。除了关注印第安人的自治权、文化权利和土地需求外，该党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外国干预，将自己的领袖定义为国家的拯救者，并且承诺改善不平等、收复资源主权、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关注各族群的中下层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利益诉求等。在反现行国家治理体制的言论上，该党领袖莫拉莱

^① Steven Levitsky, James Loxton, and Brandon Van Dyck, *Challenges of Party-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7–20.

^② Kathleen Bruhn, “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by Raúl L. Madrid (review)”, in *The Americas*, Vol. 70, No. 2, October 2013, pp. 334–335.

^③ Steven Levitsky and Roberts Kenneth M.,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5.

斯 (Juan Evo Morales) 批判传统精英和传统政党的腐败、无能和背叛。他控诉道,“我们知道有‘两个玻利维亚’,一个是欺骗者,常承诺和签协议,但从未履行,另一个总是被欺骗、被征服、被侮辱和被剥削”。^①“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通过强调印第安人和梅斯蒂索人的基本价值和利益诉求,将属于非西方的共同遗产作为连接各族群的基础。这些政治主张与话语体系融入各族群的诉求,使得该党能在不同社会力量中取得平衡,并转化为自身的选票优势,构建成为多族群联盟的包容性政党。在2002年和2005年全国大选中,该党赢得的白人投票率从5.8%升至31.6%,梅斯蒂索人的投票率从20%上升至51%。在2005年大选中,62%和28%的投票分别来自梅斯蒂索人和印第安人。^②

相较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玻利维亚的其他印第安政党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因而导致竞选表现不佳。2000年,帕恰库蒂印第安运动的领导人基斯佩 (Felipe Quispe) 奉行“两个玻利维亚”,他认为自从殖民时期这“两个玻利维亚”即“一个是印第安人的,另一个是白人的”,一直处于对抗之中,无法调和,希望“恢复被白人压迫500年的艾马拉国家”,重建殖民前安第斯政府的形式。^③这种强调单一种族特性的话语体系具有种族分裂主义倾向。它不仅排斥白人和梅斯蒂索人,还会激怒那些多种族身份的人,因而失去其他族群的支持。在2002年大选中,该党的全国得票率为6.1%,在艾马拉语地区的得票率为26%,在西班牙语地区和克丘亚语地区的得票率仅为1.4%和2.4%。在2005年大选中,该党的得票率仅为2.2%,并在竞选失败后不久便消失了。^④

2005年年底,“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袖莫拉莱斯当选总统,在他执政后致力于实施体现多族群利益的政策。在政治领域,政府确保各族群尤其是印第安人的多项权利。2009年通过的新宪法将国家定义为“多民族国家”,扩充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事方面的基本权利,并特别赋予土著居民

^① Nancy Grey Postero and Leon Zamosc, *The Struggle for Indigenous Rights in Latin America*,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4, p. 190.

^② Latin America Public Opinion Project, “Democracy Audit: Bolivia 2002 Report”, 2002, p. 49. <https://www.vanderbilt.edu/lapop/bolivia/2002-audit.pdf>; “Democracy Audit: Bolivia 2006 Report”, 2006, p. 86. <https://www.vanderbilt.edu/lapop/ab2006/bolivia1-en.pdf>. [2018-01-22]

^③ Martín Cúneo, “Nosotros nos Consideramos Seguidores y Continuadores de Tupaj Katari”, 2011. <http://www.rebellion.org/noticia.php?id=138247>. [2018-01-25]

^④ Latin America Public Opinion Project, “Democracy Audit: Bolivia 2002 Report”, 2002, p. 49. <https://www.vanderbilt.edu/lapop/bolivia/2002-audit.pdf>; “Democracy Audit: Bolivia 2006 Report”, 2006, p. 86. <https://www.vanderbilt.edu/lapop/ab2006/bolivia1-en.pdf>. [2018-01-22]

和农民更多的自决权。新宪法是由各族群高度参与制宪大会讨论制定的，并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通过。相较于前宪法，新宪法将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家置于首要位置，使得更多民众享有公民权以及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确保印第安族群广泛参与到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选举机构，比如国会须为印第安人保留一定数量的议席，最高选举法庭至少有两名印第安成员等。2009—2015年，该国130名国会议员中有41名是印第安人^①，改变了原来完全由白人精英掌控的政治体制。

在经济领域，政府收回资源主权，提升国家获取、分配和消费资源收益的能力，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2006年，政府开始对本国能源产业实施国有化，从油气工业陆续扩展到矿业、通信、电力等主要行业，其具体措施是重组国有企业、国家强行控股整合外资以及大幅增税。在油气领域，根据莫拉莱斯政府颁布的第28701号最高法令，对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YPFB）进行重组，令其全面负责全国石油天然气的管理和商业运作。在混合制企业中，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至少占51%的股权。外国石油公司须缴纳的税费从50%增至82%，其中包括18%的特许权使用费和32%的石油天然气生产直接税。在矿业和电信电力领域，政府重组国家矿业公司（COMIBOL）和国家电信公司（ENTEL）使其管理这两大经济领域。最终，三大国有企业成为玻利维亚的经济支柱。

在社会领域，针对农村和城市的中下层群体，政府通过更加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收益，扩大社会转移支付和增加公共投资以对抗贫困和不平等。一方面，2006年以来，莫拉莱斯政府实施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农村产权，以帮助长期被忽视的农村贫民、土著居民和小农生产者。2007年，政府颁布《土地法》，限制个人拥有土地面积，重新分配2000万公顷土地，按一定比例连同产权一起无偿分配给无地农民和土著居民，并为耕种者提供司法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加强社会福利，针对脆弱人群推广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CCT）。这一制度涵盖了家庭福利、妇女儿童福利以及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等社会福利政策。2007年，政府实施体面养老金计划（Renta Dignidad），每月为60岁以上的本国居民发放养老金，有其他养老金的居民则按75%的比重发放。2013年，养老金额度增加25%。该项社会福利政策所需资金占GDP的

^① Progra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el Desarrollo, *Ciudadanía Intercultural: Aportes desde la Participación Política de los Pueblos Indígenas de Latinoamérica*, 2013, p. 53.

比重超过1%，用政府征收的油气直接税来支付。另外两项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补贴。一项是“小胡安·平托助学金”计划（BJP），为有小学儿童的家庭发放补贴，并在2014年扩大到有中学生的家庭。这项计划资金的47%由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和玻利维亚矿业公司转移支付。另一项是2009年启动的“胡安娜·阿苏尔杜依”孕妇补助计划（BJA），其资金来源源于国家财政部门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①

四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前景与挑战

以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印第安族群政党的崛起，提升了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权利和政治代表性。成功的族群政党成为印第安人的“象征符号”。在拉美，包容性的族群政党更有可能成功，但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难以复制。由于族群多样性和族群矛盾，玻利维亚构建多民族国家的道路困难重重，政府需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实现整合，改变族群之间资源分配不均的差异，巩固和强化超越族裔的政治认同。

“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从社会运动发展成政党并最终成功执政，其转型能力在当代政治生态中几乎是无可比拟的。^② 该党自2006年成功执政至今已有十余年，莫拉莱斯在三次总统大选中赢得了超过50%的得票率。然而，该党仍然面临党内族群关系紧张、个人特色浓厚和族群利益冲突的挑战。

首先，“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多族群联盟的包容性政党需要特别注意平衡族群间关系，否则极易引发党内族群关系紧张。一些印第安党员反对该党与非印第安组织联盟，反对吸纳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作为党内重要职位的候选人。但拉美多数印第安政党的兴起源自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的领导，他们的诉求常常遭到忽略。与此同时，印第安政党对本族群的诉求和由本族群人担任重要职位具有天然的倾向性，对非印第安组织常抱持复杂矛盾的态度。他们担心与强大的非印第安组织结盟后，本族群政党会被边缘化或被利用，从联盟关系中获益减少。一些印第安领导者曾抱怨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的中产阶

^① Fundación Jubileo, *Reporte de las Industrias Extractivas en Bolivia 2017*, 2017, p. 6. <http://www.jubileobolivia.org.bo/publicaciones/revistas-especializadas/item/462-reporte-de-industrias-extractivas-hidrocarburos-y-mineria.html>. [2018-01-30]

^② Santiago Anria and Jennifer Cyr, “Inside Revolutionary Parties: Coalition-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in Reformist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9, 2017, p. 1260.

层占据了政府和党内的许多要职。实际上，莫拉莱斯政府任命的大多数部长都是白人或梅斯蒂索人。一位长期担任党内领导职位的印第安成员抱怨道，“印第安运动是分离的。我们有总统和外交部长，但是中产阶级担任了其他部长职位……如今，中产阶级负责制定莫拉莱斯的战略，印第安阶层只负责动员”。^①此外，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分离，多族群联盟结构尚不稳定。比如，2010年政府取消燃油补贴的法令遭到该党的城市联盟组织，如交通工会、矿工协会甚至古柯种植者的抗议，最终政府迫于压力撤回该项法令。2012年，为了争夺某个国有矿区更多的开发权与股权，属于合作社的独立矿工与另一派属于工会的国有企业矿工发生冲突，政府通过协商做出妥协，增加了前者的股权。而后者因其利益受损，在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组织下多次举行罢工。

其次，党的个人特色浓厚，组织建设的制度化缺乏建树。“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将其自身定义为草根运动和工会的“政治工具”，其政治主张是反对传统政党并取代由政党主导的代表制度。^②因此，该党采取扁平式的网络动员结构，反对传统政党的等级建构，并借助政党领袖的魅力型权威来整合和动员民众，对党进行支配性治理。它在全国许多重要地区没有设立党的管理机构，党内候选人虽在某些情况下由社会运动和人民大会选出，但基本上由莫拉莱斯全权批准。由此，党内组织建设的薄弱更会强化莫拉莱斯作为最终决定者和冲突仲裁者的权威。由于领袖个人魅力强于党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一旦魅力型领袖的地位发生动摇或者该领袖的政治继承出现问题，那么该党就可能出现分裂或者危机。^③莫拉莱斯的领袖魅力和仲裁者角色能有效凝聚多族群联盟。魅力领袖具有重要合法性和内部权威，被视为党内凝聚的资源。莫拉莱斯作为魅力领袖，他有助于紧密联系这些松散的运动组织。然而，在缺乏强有力且正式的体制渠道来协调、疏通不同利益的情况下，仅靠个人领袖魅力难以长期有效维持与联盟组织的复杂关系。^④

最后，族群利益冲突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执政面临的两难局面。该

^① Raúl L. Madrid, *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0.

^② Linda C. Farthing and Benjamin H. Kohl, *Evo's Bolivia: Continuity and Chang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4, p. 14.

^③ Raúl L. Madrid, “The Future of Indigenous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i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4. <http://hir.harvard.edu/article/?a=3236>. [2018-01-30]

^④ Eduardo Silva, “Reorganizing Popular Sector Incorporation: Propositions from Bolivia, Ecuador, and Venezuela”, in *Politics & Society*, Vol. 45, No. 1, 2017, p. 101.

党的力量基础来自于社会经济各部门，他们在长期目标上存在利益冲突，政府必须兼顾自己的目标和支持力量的诉求。^①一方面，印第安族群内部存在利益冲突。玻利维亚农民劳动者工会统一联合会、全国印第安妇女组织等属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组织已经直接融入国家政治体系。他们在农村发展和土地部以及环境部担任重要职位，在全国各级行政人事任命上享有特权，农业政策和新环境法的拟定都代表所属组织的印第安人利益。与此同时，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联合会和全国科利亚苏尤艾柳和马尔卡委员会（CONAMAQ）是分别代表低地和高地的两大印第安组织。它们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农村地区的主要联盟组织。然而，由于两大印第安组织不满议会为其保留的席位少，全国科利亚苏尤艾柳和马尔卡委员会一度宣布退出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签订的《团结协议》，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另一方面，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与印第安人的社会环境利益存在冲突。由于莫拉莱斯政府保持了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以资源收益作为社会再分配的基础，这种以攫取主义作为新的发展模式与印第安人的美好生活方式存在根本矛盾。2011年，穿越伊西博罗原住民保护地国家公园的高速公路的修建问题引发了莫拉莱斯执政以来最激烈的社会冲突。该高速公路计划遭到了玻利维亚东部印第安联合会和全国科利亚苏尤艾柳和马尔卡委员会的强烈抗议，这两大组织认为政府侵犯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自治权和开发项目事先咨询权，为此该计划暂被搁置。2017年，政府宣布修建穿越伊西博罗原住民保护地国家公园公路的新法生效。这场社会冲突凸显了印第安人因其生存环境受挤压而与政府代表的主体族群之间的资源竞争性冲突，印第安人的土地绝对自治权诉求给莫拉莱斯政府的合法性带来挑战。

（责任编辑 王帅）

^① Santiago Anria and Jennifer Cyr, “Inside Revolutionary Parties: Coalition-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in Reformist Bolivia”,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50, No. 9, 2017, p. 1258.